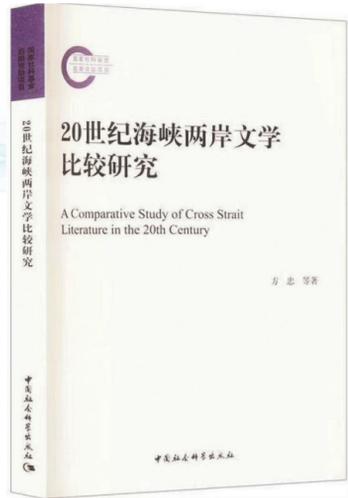


在中国文学整体性中对两岸文学的再发现

——评《20世纪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研究》

□吴 鹏



《20世纪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研究》,方忠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2月

虽然台湾文学确实接受了“日”风“美”雨的影响,但由于中华文化这一共同根源的存在,无论是语言、文字、审美观念还是价值观念,台湾文学和祖国大陆文学都保存着共同的祖先烙印与历史记忆,这种文化的共通性使得两岸文学在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感、思考人生意义等方面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和风格

段还是在现代阶段,台湾文学主要是在大陆文学的“引领”与“启蒙”之下走上发展之路。即使在1949年之后两岸由于历史原因迈入不同的发展轨道,文学创作也由此衍生出不同不尽相同的美学样貌,但同文同种的文化背景下这本是因文学生产机制的差异而形成的“百花齐放”的正常表现,不应成为遮蔽台湾文学中国属性的借口与饰辞。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试图以“本土化”的立场否定两岸文学的渊源关系,提出台湾文学发展“断裂说”。这是赤裸裸的分裂主义的表现,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并加以有理有据的驳斥。

从这个角度来说,《20世纪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研究》所采用的研究视角就具有非常宝贵的“辨伪”价值,它通过丰富的文学史料与具体的文本分析论证了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之间的血脉亲缘。其中,有同一历史坐标中的平行比较研究。如第一章以“光复前台湾与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比较”为题,从二者的创作渊源、创作母题、文化内涵以及两地作家的创作心态与话语策略等方面展开对比研究,在强调“五四”文学精神贯穿始终的基础上,纵横向梳理了两种文学现象的生成与发展脉络,也横向比较了两地乡土文学的主旨意涵与言说方式,并最终归纳出“两地乡土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常避开敏感的政治主题,借咀嚼城乡小人物的命运意味,以及借反省中华民族文化来寄托自己在异族欺凌下的激愤怨恨。以

家庭为窗口,透视殖民地的生活全景,暗含了反帝的色彩,写出了黑暗社会的实景”等颇有见地的论断。除了平行比较之外,也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错位”比较。如第二章以“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大陆朦胧诗比较”为题,分别从历史生成、诗歌观念、主体觉醒、艺术特征等四个方面述及两种诗潮之间的“异时同质性”,以宏阔的视角和整合的姿态重新审视中国诗歌史,认为如果以“实践新诗再革命”的理论着眼点来看待这两种前后相距近三十年的诗歌运动,实际它们都是在时代的边缘完成了对主流话语的逆袭,也在对现代诗歌审美原则的不断探索中形成了对“五四”诗歌传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历史回响。

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使原本断裂的中国诗歌史重新接续一体,而且也在大陆诗坛与台湾诗坛的相互激荡中划出了传承有序的完美闭环,以文学的形式表征出海峡两岸血液于水、唇齿相依的事实。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海峡两岸文学研究往往只关注特定地域或单一时期的局限,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比较研究框架之中,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两岸文学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独特性和共通性,同时也生动呈现出共同体书写中的前后呼应与多元样态。

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研究》也多有创新。除了总体上采用“比较”视角之外,在局部研究中还借鉴了诸如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巧用

使该著在析解两岸文学内部机制的同时,也能敏锐地捕捉到外部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以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挖掘出更多富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意识及探索路径。著作的主体部分共有八章:第一章借助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等方法,讨论光复前台湾与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异同;第二章通过整合视角论述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大陆朦胧诗的同质性特征;第三章从观念、主题、技巧等方面探析鲁迅对陈映真小说创作的影响;第四章从价值立场和乡土情怀的角度述及沈从文与黄春明乡土小说的精神关联;第五章以悲剧意识为切入点研析曹禹和白先勇文学创作的终极关怀;第六章从意象、语言、风格等方面探讨余光中与徐志摩诗性散文的异同;第七章从叙事、修辞、人物等角度梳理张爱玲与施淑青小说的传承关系;第八章在史传传统、现代意识、雅俗汇融等层面将高阳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加以比较。这些镜像般的映照研究,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有机融为一体,深化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

如大陆作家沈从文和台湾作家黄春明分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以往的文学史论述中两者要么被分别表述,要么在并置后模糊地以“同属”乡土作家”而一笔带过,但该书著作在讨论两人的精神关联时明确指出,他们的作品在继承和批判的同时都蕴藏着作者重建国民精神的理想,区别在于沈从文醉心于“希腊的小庙”,希望借此吐故纳新以重新点燃整个民族的激情,而黄春明则在台湾转型时刻,一面描写宜兰人的美好品性,一面强烈批判奴颜婢膝、崇洋媚外的都市人的虚伪嘴脸。这就从细节处论证了虽然沈从文和黄春明笔下都有城乡的二元对立,作者也都从中寄寓着对国家民族的殷切厚望,但在抽象的人性和现实的乡土等方面却侧重不同,各擅胜场。这种通过具体的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显然更具说服力,其研究思路也同样见于其他章节的文本阐释中。

《20世纪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研究》凭借独特的视角、扎实的论证、严密的逻辑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也为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繁花正锦簇

——《香港当代文学精品·散文卷》读札

□钱 虹



《香港当代文学精品·散文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

散文的特点就在于它有一种天然的松弛、真挚、平和和从容。它可以叙事,可以议论,也可以二者合一而夹叙夹议;它能够展露才学、能够显示智慧,也能够二者兼具而文采斐然。

二

相形之下,散文比之其他文体更崇尚心态的从容舒缓和文字的朴实自然,因而感情的流露不能漫无节制。在一些文坛宿将如巴金、丰子恺、孙犁、汪曾祺、杨绛等人的“老年散文”中,似乎更能使人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寓深沉丰腴于平淡朴素之中的独特韵味。香港的老年作家的散文亦然。已故作家司马长风、徐速、何紫、罗孚、陈德锦、胡燕青、秀实、舒非、陈少华、张开冰等后起之秀的篇什。在入选作者方面,《散文卷》可谓老、中、青三代同堂,名家与新秀一起登台亮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卷》虽非篇篇“精品”,并且不无遗憾,却也向读者提供了检阅香港散文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本。

或许正是由于作者年龄上的差异,《散文卷》入选作品中,青年和中年作者自选的散文往往以写景状物的感性小品和咏志抒怀的抒情散文居多,而这些作者中有些人本身即是诗人,如黄国彬、羁魂、胡燕青、王良和、梦如等,因而,其散文难免流露出浓浓的诗化倾向,文中亦多运用诗歌的比喻、象征、夸张甚至“通感”的手法,如:黄国彬的《盛夏过后》中有“新闻和音乐都不听,只听虫声;并且让浮上阳台的玉兰花香轻触我的头发和颈项”之句;张开冰的《桂香的季节》中也有“桂香扬起满天的秋意。疏疏的一树树枝杈在月影下是幅奇妙的风景,室中洋溢化不开的甜味”等句,用的都是诗中常见而散文中少见的“通感”手法,使人读之如闻花香,如品甘醇。再如王良和的《植物小品三题》也多以写诗的感觉入文,如写夏日午后,“清凉的树阴下,拥着一缕暗香迷糊入眼,一觉醒来,从丛的气根仿佛垂落到头顶。那真是最美丽的错觉”(《细叶榕》),诗人的浪漫气质于此显露无遗。类似的例子在《散文卷》中不胜枚举。

不过,“诗化”倾向终究不是散文的专利。说到底,散文乃文而非诗。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正在于散文不必像写小说那样挖空心思地虚构人物、编织情节,也不必像写诗那样殚精竭虑地捕捉意象、斟酌韵字,更不必像编剧那样设计台词、制造悬念。它可以用最普通、最平常的文字,抒写个人的真性情和真感觉。比如黄国彬的散文《盛夏过后》既有诗意盎然的一面,也有坦露真实性情的一面。没有刻意修饰的句,也没有精心雕琢的词语,却以最普通的文字、话家常的口吻,道出了作者“恋家”的中年情怀,随意而又真挚。

描述了自己此后所独自承受的精神压力和内心折磨。从离开诊所时,双脚如腾云驾雾,顿觉“世界突然像篇谎言”的绝望,到最后医生在电话中报告验血结果正常,从而带来“闯过鬼门关的欢欣”,整个心理变化过程一波三折而又真实自然,如“宽恕伤害我的人”那一节写作者夜不能寐,想到要写遗嘱,想到亲人和师友,想到“所有血肉相连的人”,甚至“也想起那些蛇一般妒我的人,火一般恨我的人,狼一般伤害我的人!现在我都由衷地宽恕”。像这种抒写个人的内心隐秘情感的文字,在司马先生的史学专著中肯定是读不到的。而读了《噩梦》之后,你会对作者产生由衷的敬意,因为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等书正是在他“噩梦”之后得以完成的,你会倍感生命之珍贵可爱。何紫的《临终人语》,则完全摒弃了“噩梦”式的叙事和抒情,不温不火地记录了一位濒死的友人最后的话语,却更可作为作者面对死亡的内心独白,如“我当然不会永生,但这一群朋友会怀念我,我就是生的延续,已经很富足了”,以及绝笔之作《不惑》中慨叹“个人手中的岁月也太有限了”,“那么凭一己之力把自认最在意的事做好,也就很值得安慰”等语,在平淡朴素之中寓有哲理的深沉。这种深沉并非来自剑拔弩张的标语口号,也不属于空洞做作的无病呻吟,联想到作者本人因患肝癌已去世多年,再读其文便有一种如见其人的亲切自然之感。

三

当然,像司马长风、何紫这样展示生死关头的生命抉择与内心体验之作,毕竟不是多数香港散文艺术的审视焦点。不少作家在关注个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同时,更以一种“过来人”身份,注视着他们生活于斯的外部世界的变化,如小思的《遮打花园》、黄继持的《浅水湾》、慕容羽琴的《浓浓港情》、陶然的《记忆中的风景》、阿浓的《村居小品三则》、陈德锦的《田园琐记》等。与一般纯粹摹景状物的抒情散文不同的是,这些散文融入了一种历史和人事变迁的沧桑感。如《遮打花园》,从作者儿时由父亲带领经过一排排铁栅栏围住、禁止华人人入内的木球场,“到人人能进去闲游的遮打花园,里面已经包含了许多历史故事。如果说我对这园情有独钟,那就只为我对其历史的演变,有太深的印象了”。《浓浓港情》亦是由对港岛的旧日景观和人事的回忆,“充分描写了香港生活的变化轨迹”。

四

就香港散文作者的类别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士人散文”与“市民散文”两大类。这两类散文同样丰富多彩。在一些香港学者型作者的“士人散文”中,你常常可以体会到一种集机智、灵活、幽默、风趣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如黄国彬的《书到运时方恨多》、黄继持的《期待文学强人》、潘铭荣的《热闹的寂寞》、陈家春的《说“伊”四则》等。梁锡华在散文创作领域因得之于中外古今学养之丰腴而显得出入自如,游刃有余,叙事时委婉曲折而露风趣,议论则妙语如珠而不呆板,抒情乃情景交融而蕴诗意。入选《散文卷》的新作《停思坐爱秋霞晚》熔抒情与议论于一炉,其中的比喻生动、形象和奇妙,如“新居像新鞋,往往给人或多或少的不便”,再如“秋日午后五时半过一点,太阳已坠山后,慵倦得像给办公室抖落于行人道上的白领阶级”,以及“太阳在西山后落寞一时也必然有转机,它宛如上班族人士下班后经美式下午茶的热力和活力点亮全身细胞,脸面刹那间堆起春花,而红润、清朗、俊丽都开灿烂了”等妙语佳句,在其散文中俯拾皆是,充分体现了梁氏驾驭语言文字的精湛功力。曾任《明报》总编辑的

董桥,他的《中年是下午茶》除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识和机智的文风外,还充满了一种自嘲调侃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不是靠摆些小噱头、博人一粲而已,它主要得之于轻松泰然的心态。大智若愚的智慧和一连串信手拈来的妙喻,如:“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这段议论,将“中年最是尴尬”的命题阐释得风趣无比,绝妙无双。议论性散文写到这份儿上,真可谓飘逸潇洒了。

由于版权等诸方面的原因,《散文卷》未能收进像叶灵凤、曹聚仁、徐訏、吕伦、刘以鬯、金耀基、石人(梁小中)、项庄、也斯、舒巷城、西西、李默等名家的散文,不免使人有遗憾之感。但其中收有董桥等人的妙文佳构,也够让人一饱眼福了。至于入选的散文并非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那也无妨。你甚至可以乘兴鉴赏一番其中的多重景观,伸手撷取一些你认为美丽的珠玑,哪怕是几个有棱有角的贝壳,那也是大海的无私馈赠。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董桥,他的《中年是下午茶》除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识和机智的文风外,还充满了一种自嘲调侃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不是靠摆些小噱头、博人一粲而已,它主要得之于轻松泰然的心态。大智若愚的智慧和一连串信手拈来的妙喻,如:“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这段议论,将“中年最是尴尬”的命题阐释得风趣无比,绝妙无双。议论性散文写到这份儿上,真可谓飘逸潇洒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董桥,他的《中年是下午茶》除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识和机智的文风外,还充满了一种自嘲调侃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不是靠摆些小噱头、博人一粲而已,它主要得之于轻松泰然的心态。大智若愚的智慧和一连串信手拈来的妙喻,如:“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这段议论,将“中年最是尴尬”的命题阐释得风趣无比,绝妙无双。议论性散文写到这份儿上,真可谓飘逸潇洒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四季平安 李退之 画